

介绍

二十世纪初,上海市内有各种各样的志愿社团。他们在范围内
期间
从乡土协会、行会、商会、专业协会、基督教会、秘密社团、黑社会、工会、政党组织,到
东道主

教育、职业、学术、体育、艺术、戏剧和文学社团,总共有数百个。设计的

出于各种经济、社会、政治、知识和文化目的,
自愿协会以合法或非法、公开或秘密、公共或私人实体的形式运作。协会和多样

化
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社会
复杂的社会动态在城市内外显而易见,并提供
上海政治、社会和文化史上的大部分戏剧
时间。本书探讨了一种重要但研究不足的类型
那些社会团体和协会,即中国专业人士和
他们的协会。

中国近代史学者曾用“专业
协会”是指商会、银行家协会、
教育学会和律师团体

zhiye zh (免费专业人员)。这个词的起源是模糊的。期限
可能是德语单词freiberufler或freier beruf的翻译,
尽管还有待发现谁首先使用或翻译了该术语
在中国。¹中国“职业”概念的历史相当悠久。

1. 感谢斯德哥尔摩大学的 Haken Friberg 向我推荐了这个职位
德语单词被翻译成中文的能力。

介绍

与德国类似。在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字或区分“职业”和“职业”的术语 两者都是叫志业。²直到1929年,“子游之夜者”这个词才被国民党(GMD)官方文件认定专业群体,包括医生、律师、会计师、记者、工程师和教授,以及自有之夜团提一词来指代他们的组织。

此后,这些团体都称自己为“子游之夜者”。

然而,它们并不相同。医生和律师(和会计)是个体户或独立的专业人士,而记者(连同教授和工程师)是专业雇员或受薪专业人士。他们被认定为

到1929年,一个特定的社会类别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反映了GMD对社会群体进行分类的计划,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控制,并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愿景。此外,包括所有这些群体的自由专业人士的概念

表明其起源于西方,因为这些职业在西方已被承认为职业。⁴另一方面,那些不同的群体

被认定为一个类别,因为他们确实分享了一些东西

共同点,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共同点。职业群体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公认的社会类型。在

同时,这些专业群体的发展可能

作为中国现代转型或现代化的衡量标准。⁵

2. 关于德国案例,见 Konrad H. Jarausch, *The Unfree Professions: German Lawyers, Teachers and Engineers, 1900-1950* (牛津,1990),第4-5页;“德国职业 History and Theory”,载于 Geoffrey Cocks 和 Konrad H. Jarausch 合编, *German Professions, 1800-1950* (Oxford, 1990), pp.10-11; Charles E. McClelland, *德国的专业化经验* (剑桥,1991年),第15页。

3. GMD 文件中不包括自有类教授协会直野团提,但在选举人大代表时,1931年,教授被允许作为自由圈子的一部分参加选举专业人士。

4. 西方关于职业化的文献表明,这个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越来越多的职业需要专门的培训,因此声称

专业知识,并要求承认为专业。有关几个西方社会职业化的经验,请参见塞缪尔·哈伯 (Samuel Haber),《寻求权威》和
美国职业荣誉,1750-1900年(芝加哥,1991年);杰弗里·科克斯和
Konrad H. Jarausch 编辑, *德国职业,1800-1950*;查尔斯·E·麦克莱兰,
德国专业化经验; Konrad H. Jarausch,《不自由的职业》;
Harold Perkin, *专业社会的兴起:1880年以来的英格兰* (伦敦,1989年);
Roy Lewis 和 Angus Maude, *Professional People* (伦敦,1952年); WJ读者, *职业男性:19世纪英国职业阶层的兴起* (新约克,1966年)。

5. Magali Sarfatti Larson 指出,对于职业来说,最重要的方面

介绍

前面的观察使我们达到了本书的目标。通过考察这些专业群体的发展,如律师、医生和记者,以及政治和社会文化它们出现并发挥作用的环境,本研究旨在阐明影响我们理解城市社会的三个问题在民国时期。首先,通过分析专业人士的经济状况、生活方式、文化功能、社会认同和政治倾向,本研究将展示中国专业人士的外貌特征。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范畴反映了一种新的阶级形成民国上海现代化进程中。其次,批判性地使用最近的“专业化”概念

关于该主题的奖学金,本研究将证明专业协会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其他城市协会方法。最重要的区别源于专业协会的专业关注和他们在专业化方面的努力。这种差异进一步表明了日益增加的异质性当时的城市社会和城市政治的复杂性。第三和最重要的是,通过阐明共和国国家在中国专业化和审查专业协会与国家和其他城市组织的关系,本

研究将提出共生动力学的概念,其特征存在于民国时期的中国国家社会关系[J].综合民国上海的城市社会及其关系

国家,这项研究提供了一个参考点来观察当代中国的国家和社会的类似的和持续的转变。

专业人士及其协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

虽然不同类型的志愿协会早已存在于中国农村和城市,专业协会没有出现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直到 1912 年共和国成立后。在几个重要方面,中国专业人士的崛起及其协会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许多传统组织及其 20 世纪的化身 例如私人组织

现代化是科学和认知理性的进步,以及与之相关的分工合理化和日益分化。见 Magali Sarfatti

拉尔森,专业精神的兴起:社会学分析(伯克利,1977年),第 xvi 页。

介绍

学者们对学院、宗族、秘密社团、犯罪团伙、贸易行会、城市绅商组织和乡土协会进行了研究。6 与这些组织相比,专业组织的起源和功能无疑是城市和现代的。专业人士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出现是基于现代教育、现代经济和技术、现代大众媒体、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作用的新概念、职业发展的新模式以及总体上的西方影响。所有这些因素都特定于一个组合城市环境与现代化进程。

专业人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中国人。传统上,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文人)是儒家通才,他们在儒家经典、历史和文学的知识和呈现方面拥有专业知识。这些知识领域密切相关,技术上没有区别。清末新政改革(1901-1911)通过废除科举、开办西式学校、推进工商业司法改革等,正式引发了一场变革。

6. 对于私立学院,参见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1990)。有关血统,请参见 Mary B. Rankin 和 Joseph W. Esherick 合编的《中国本土精英和统治模式》(伯克利,1990年)。关于秘密社团,参见 Jean Chesneaux 编着的《中国的大众运动和秘密社团,1840-1950年》(斯坦福,1972年); Frederic Wakeman Jr., *上海警务,1927-1937* (伯克利,1995); Bryan G. Martin, 《上海绿帮:政治与有组织犯罪,1919-1937年》(伯克利,1996年)。对于商人组织,请参见 Susan Mann Jones, “上海的 Ninpo Pang 和金融力量”, Edward JM Rhoads, “广州的商人协会,1895-1911”,

David D. Buck, “Tsinan 的教育现代化,1899-1937”, Shirley S. Garrett, “商会和基督教青年会”, Mark Elvin 和 G. William Skinner 合编,《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斯坦福大学,1974年); Joseph Fewsmith, 《民国时期的党、国家和地方精英:1890-1930 年上海的商人组织和政治》(檀香山,1985年); Marie-Claire Bergère, *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 (剑桥,1989); Marie-Claire Bergère, “上海银行家协会,1915-1927:现代化和地方团结的制度化”,载于 Frederic Wakeman 和 Wen-hsin Yeh 编辑,《上海旅居者》(伯克利,1992年); 汉口的威廉·T·罗 (William T. Rowe): 1796-1889 年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 (斯坦福,1985年); 汉口的威廉·T·罗 (William T. Rowe): 1796-1895 年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 (斯坦福,1989年); David Strand, *Rickshaw Beijing: City People and Politics in the 1920s* (Berkeley, 1989); 许定新、钱晓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总商会史)(上海,1991); 马敏、朱瑛,《传统于今代的二重汴州:万庆苏州上汇葛安烟酒》(传统与现代的双重变化:晚清苏州商会的案例研究)(成都,1993)。关于本土协会,请参见 Bryna Goodman, *本土、城市和国* 家:上海的区域网络和身份,1853-1937年 (伯克利,1995年)。

介绍

知识结构及其社会文化意义。晚清已经通过大众消费写作的方式,看到了受教育者作为人民的启蒙者和公共事务的仲裁者的新观念 一个不同于传统类型的士大夫或文人的角色⁷。20 世纪进一步见证了为受过教育的人开辟了新的职业道路和创造了新的社会文化角色,包括以专业人士的身份工作和生活。

专业协会在某些方面也代表了对过去的背离。早先的研究表明,在传统的或转型的城市组织(如上海总商会、上海银行家协会、行业行会和乡土协会)中,乡土关系和家庭关系是重要的和决定性的。组织和职能机制。⁸同样,本地血统是上海工人阶级划分和政治界定的路线之一。⁹这种联系对专业协会显然不重要 为城市协会和城市政治提供了一个新视角。¹⁰

上海的专业人士之所以成立自己的组织,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专业兴趣或团体兴趣。
同时,他们对国家事务的关切也更加广泛,

7. Leo Ou-fan Lee 和 Andrew J. Nathan, “大众文化的开端:晚清及以后的新闻和小说”,载于 David Johnson, Andrew Nathan 和 Evelyn Rawski 合编的《大众文化》中华帝国晚期(伯克利,1985 年),第 360-95 页; Joan Judge, 印刷与政治:“世宝”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斯坦福,1996 年)。关于晚清的改革,见梅里贝思·卡梅伦,中国的改革运动,1898-1912 (斯坦福,1931); Douglas R. Reynolds, 中国, 1898-1912:新郑革命与日本(剑桥,马萨诸塞州,1993 年)。关于教育改革,参见 Marianne Bastid, Education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Ann Arbor, 1988); Sally Borthwick, 中国的教育和社会变革(斯坦福,1983 年)。

8. 关于战前上海商界错综复杂的本土关系,见玛丽-克莱尔·贝吉尔,《黄金时代》第三章; Marie-Claire Bergère, “上海银行家协会”; 苏珊曼琼斯, “Ninpo Pang”。

9. Elizabeth J. Perry, 《上海罢工:中国劳工的政治》(斯坦福,1993 年)。

10. 这些专业协会的现有会员名录显示其会员来自全国不同地区。例如,上海律师协会的成员来自十六个省和一个省内的不同县。它的领导人也来自不同的家乡。见《上海路氏公会汇源路》(上海律师协会会员名录),1934 年。

介绍

信奉科教兴业、依法治国的思想（科学救国、教育救国、世纪救国、法制救国）。这些冠冕堂皇的目标也符合专业人士的自身利益。诚然，城市中传统的或过渡性的工业、商业和银行利益的城市精英共享一些民族主义情绪和目的，他们的协会在共和时代采用了类似的民主组织原则。¹¹但仍然存在基于专业兴趣的专业协会与其他类型的城市组织之间的差异。

为了把握专业人士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和联系，可以将中国专业人士视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既是城市中产阶级，又是专业阶层。反映了一种新的社会阶层形成。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对于什么是阶级或如何定义阶级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而众所周知，“中产阶级”难以界定。然而西方和非西方关于中产阶级的文献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的社会通常包括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以及公务员和传统的小资产阶级。¹²在现代中国的学术研究中，曾提到 20 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专业群体和新城市阶级，但没有一个得到充分分析和充分理解。¹³民国时期社会阶层的形成。

11. Marie-Claire Bergère, “上海银行家协会”。

12. 有关定义类的不同方法的有用概述，请参见 Albert Szymanski, *Class Structure: A Crit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1983), pp. 602-45. 有关西方和非西方社会中作为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的讨论，请参见 Pamela M. Pilbeam, *The Middle Class in Europe, 1789-1914: France, Germany, Italy, and Russia* (Chicago, 1990), 尤其是第 4 章；Jurgen Kocka 和 Allan Mitchell 编辑，*19 世纪欧洲的资产阶级社会*（牛津，1993 年）；George Lavau, Gerard Grunberg 和 Nonna Mayer 编辑，*L'Univers Politique des Classes Moyennes*（巴黎，1983 年）；Bhagwan Prasad, *城市中产阶级的社会经济研究*（德里，1971 年）；BB Misra, *《印度中产阶级》*（牛津，1961 年）；国家社会和经济研究所，*巴基斯坦中产阶级的增长*（卡拉奇，1971 年）。

13. 例如，约瑟夫·福史密斯（Joseph Fewsmith）使用“中产阶级”一词来“描述范围广泛的商人，从至少相当可观的商人到参与全国商品运动和相关抵制的数千名店主。”显然，这只是城市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参见民国时期的党、州和地方精英，第 9-10 页。

介绍

用于分析中国专业人士的社会地位

民国上海,对阶级定义采取折衷的方法就足够了。

显然,专业人士可能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因为他们

在社会生产结构中的地位 (无论是资本家还是

工人) à la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理论。同时,知情的

通过对阶级定义的各种方法,可以指出职业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方式,他们在技术分工中的地位

(心理与手动),以及他们的感知和自我感知

社会。包括上述所有内容的是专业人士对专业精神的承诺,将其作为他们特有的新价值,并将专业化作为有益于

他们。的确,中国专业人士在专业化方面的努力

当专业化也被视为一个过程

将个人融入一种职业的社会阶层形成

各种专业或专业社区或专业班

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处于中等地位或阶层,

国家与整个社会之间。

然而,正如所料,即使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中国人

专业人士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形成一个单一的实体

民国上海的其他社会群体和阶层。¹⁴

上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职业共同体意识,他们绝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在经济环境、社会声望、政治态度、群体等方面存在差异。

身份和文化功能。专业人士也不是自给自足的

群体与上海的其他社会元素分开。恰恰相反,他们与城市中的其他社会团体和组织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联系,

超过。事实上,专业人士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是

社会结构和政治形成的更大过程的一部分

民国时期的中华

社会类别。

14. 最近关于现代上海的学术研究令人信服地表明,上海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横向分层的

沿经济线和沿原产地线垂直分离,

文化实践、政治取向 (或资产阶级的政治关系)

类和当地情况。见 Emily Honig,姐妹和陌生人:女性

上海棉纺厂,1919-1949 (斯坦福,1986) ; Elizabeth J. Perry,上海

罢工; Alain Roux, Le Shanghai Ouvrier des Années Trente: Coolies, Gangsters et Syndicalistes

(巴黎, 1993); Marie-Claire Bergère,黄金时代;克里斯蒂安·亨利奥特,

上海,1927-1937:市政权力、地方性和现代化 (伯克利,1993 年) 。

介绍

捕捉不断变化的城市中的动态和关系
社会,本研究强调社会活动
律师、医生和记者。联合行动主义并不一定意味着政治行动主义。专业协会开始

严格的专业目的,这使它们在功能上与其他城市组织。他们只是逐渐陷入了政治运动的浪潮,进一步将它们在社会和政治上与其他社会团体和组织。两个方面专业人士的协会活动很重要,因为他们有助于城市政治和国家社会的复杂动态

当时的关系。

在 1912 年至 1937 年期间,集体行动的一般模式专业人士中出现。记者们在将自己组织成正式的专业协会并参与定期的协会活动方面进展缓慢。他们的职业成熟伴随着政治

1930年代国家危机时期的激进主义。相比之下,上海律师组织得最好,他们的律师协会运作得最好在专业和政治方面都有效。西式医生本土医生在追求群体利益方面同样有效通过他们的组织,尽管他们在纯政治问题。这项研究的关注点之一是解释这些专业群体的结社行为的差异。

本研究重点关注上海的专业社区
原因 在那个通商口岸,中国专业人才聚集在最大的数量和每一个有利于职业兴起的因素都是最发音。Marie-Claire Bergère 曾经有力地辩称,尽管上海的租界,“上海很明显是中国人”。代表现代主义、民主和国际传统,上海是一个少数民族和边缘化的中国,“但与中国农村一样真实。”¹⁵正如本研究将表明的那样,虽然外国存在上海的主导地位确实在某些方面影响了中国专业人士在上海的行为,人们可能不会认为上海的中国专业人士的总体特征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同行完全不同。就国家问题和危机时刻保持密切沟通

专业组织之间的协调行动和采取的协调行动

15. Marie-Claire Bergère, “‘另一个中国’:1919 年至 1949 年的上海”,载于 Christopher Howe 编着的《上海:亚洲大都市的革命与发展》(剑桥,1981 年),第 13-34 页。

介绍

上海和全国其他地区,前者在玩一个领导角色。如果中国专业人士及其组织在城市社会中的作用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可以在民国上海的背景下进行描述,那么分析应该是

相关的其他中文专业群体的理解
城市也是如此。

中华民国的专业化

以比较的视角阐明和检验民国上海的职业社会认同及其与社会的互动

状态,本研究采用专业化的概念。上海专业人士可以被认定为中国城市中独特的社会类型社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专业关注。他们的协会旨在专业化的活动最清楚地区分了他们
在各种城市协会看似相似的制度特征和集体行动中,来自其他社会群体。

在描述和概念化西方职业和职业主义的兴起时,社会学家使用了两种一般方法或模型:(1)“属性模型”和(2)“过程模型”(也称为功能主义方法和功率分析方法)。这属性模型应用了几个属性作为定义职业所必需的。被引用最多的三个属性是(1)基于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的理论和知识,(2)奉行服务公众的职业道德,无论金钱奖励如何,以及(3)通过自我调节实现服务的自主性和垄断性并控制进入该行业的标准,通常与一个专业协会。一些学者确定了更多的属性,但欧内斯特·格林伍德认为前三个是必不可少的 one 和 others 是派生的。 16

开发过程模型是为了回应和批评属性模型。它认为属性模型在表面接受将某些职业群体对专业地位的主张视为定义属性。流程模型表明需要做的是分析这些团体如何提出主张以获得合法性。

16. Ernest Greenwood, “职业属性:重访”,Sheo K. Lal 等人,编辑,《职业社会学读物》(德里:Gain 出版社,1988 年),第 12-14 页; Ronald M. Pavalko, 职业和职业社会学(伊塔斯卡,伊利诺伊州,1988),第 19-29 页。

介绍

它进一步指出,属性模型存在缺陷,因为它无法呈现过于僵化的职业图景,而事实上职业群体可能位于从非职业到职业连续统一体上。一些使用过程模型的研究提出了专业化模式,这些模式表明了某些定义属性会出现的时间阶段,尽管学者们对这些特定阶段的具体顺序存在分歧。¹⁷正如过程模型的倡导者所指出的,属性模型对职业群体声称职业地位的过程如何受阶级结构的性质影响不敏感,并且忽略了重要变量,例如国家在职业化中的作用。¹⁸简而言之,过程模型强调将职业化分析为一个由阶级结构、国家角色以及职业获得和使用权力的历史过程。

虽然过程模型(权力分析方法)极大地推进了职业研究,但受到英美经验的影响,该方法的学者也忽视了欧洲大陆国家专业团体的经验。Magali Sarfatti Larson 曾认为法国和德国的案例更接近于公务员模式而不是职业模式,并选择研究英美社会职业化的“更纯粹”特征。¹⁹同样,艾略特·弗雷德森认为,“作为一个制度性概念,“专业”一词在本质上与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及该历史时期仅与有限数量的国家联系在一起。”²⁰最近关于专业化的学术研究一直在纠正这种偏见。有人指出,以英美经验为标准,限制了对欧洲大陆国家专业化的全面理解。关于专业团体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关于专业团体不受政府干预英美社会的旧假设需要修改,因为专业团体

17. Ronald M. Pavalko, 社会学, 第 34-35 页。

18. 同上, 第 29-38 页; Terence J. Johnson, 《职业与权力》(香港, 1972 年), 第 21-38 页。

19. Magali Sarfatti Larson, 专业精神的兴起, pp.xvii-xviii。

20. Eliot Freidson, “The Theory of Professions: State of the Art”, Robert Dingwall 和 Philip Lewis 合编, The Sociology of the Professions: Lawyers, Doctors, and Others (伦敦, 1983 年), 第 26 页; 另见 Eliot Freidson, Professional Powers (芝加哥, 1986 年), 第 30-38 页。

介绍

这些国家的协会利用国家权力加强对服务的垄断和控制市场。21另一方面，

国家在塑造和规范职业方面的作用要大得多

在德国和法国等国家,不应否定那里的专业化经验。正如 Magali Sarfatti Larson 最近观察到的那样,“过去存在而且存在不止一种专业化模式。”22

根据该主题的奖学金,本研究将表明专业化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阐明了中国专业人士与共和党国家之间的互动。研究期间没有在上海从事任何职业展示欧内斯特格林伍德建议的所有三个主要属性。他们如果用更详细的方法来衡量,就不太适合被称为职业属性列表。然而,从专业化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过程,中国职业的出现和成长可以恰当地被视为一个自觉的专业社区的兴起在共和上海及其他地区。所有华人专业团体努力树立职业标准,获得国家和社会认可的职业地位和特权

大,这是专业化的本质。他们这样做是通过通过专业协会组织和行动,这通常是其他地方专业化的关键特征。虽然有不同探索民国与上海专业协会互动的途径,专业化是其中之一

动力学中最重要的元素。

德国的专业化经验尤其重要进行比较。与德国同行一样,中国政府在共和时代在促进和规范职业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有助于一些职业的职业化

21. 参见 Charles E. McClelland, 《德国经验》,第 7 页。

22. Magali Sarfatti Larson, “在专家和专业人士的问题上,或者说什么都不说是多么不可能”,Rolf Torstendahl 和 Michael Burrage 合编, The 职业的形成:知识、国家和战略 (伦敦,1990 年),第 29 页。托马斯布罗曼认为,对于德国医生来说,职业化是为了捍卫而不是获得他们在工业化之前所享有的地位和特权。

因此,关于专业化作为现代化一部分的假设需要重新考虑。参见 Thomas Broman, “重新思考专业化:理论、实践、和 18 世纪德国医学中的专业意识形态”,《现代史杂志》, 67 (1995 年 12 月):335-72。在我看来,这里的德国案例只是说明了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变化和复杂性。

不同的社会。

介绍

天井组。这样的角色得到了专业人士的充分认可和赞赏,认为这是他们实现目标所不可或缺的。1916年至1927年,几个军阀政权相继在北京向中央政府提出主权要求,没有一个是稳定的。然而,上海的专业人士愿意支持任何政权的合法性主张,无论在特定时期谁掌权,以通过政府的制裁确立自己作为社会专业人士的合法性和特权。

另一方面,中国的职业化明显偏离了西方(英美和欧洲大陆)的经验。一个重要的区别是,一旦获得了行业协会的合法性,专业权力往往不仅仅用于专业目的。关键是,中国专业人士的行动是受两种历史力量的交汇影响和制约的。一个是作为现代化一部分的专业化,另一个是城市精英协会在公共领域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传统,这种传统至少从晚清开始就形成了。²³

随着专业协会开始在社会和政治上发挥作用,它们以不同于传统精英群体的立场在国家和社会利益之间进行调解。虽然城市精英协会代表公众(功)的争论在民国时代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专业协会作为政府正式认可的公共机构的地位至关重要。²⁴这种地位加强了专业协会在不小的措施可以转移国家压力,因为它们在公共领域的广泛问题上发挥作用。这种“公开性”是由某些关键词来表示的。在民国时期,专业协会,以及贸易行会、商会、教育协会和其他政府批准的组织都被纳入其中

23. 我使用 Rankin 和 Esherick 定义的“公共场所”：“场所是环境、舞台、周围的社会空间,通常是精英和其他社会行为者参与的场所。竞技场可以是地域性的(村庄、国家、民族)或功能性的(军事、教育、政治);竞技场的概念包括其组成参与者的价值观、意义和资源。”参见 Rankin 和 Esherick 编辑的《中国本地精英》,第 11 页。

24. 关于“公共”(功)的含义及其在帝国晚期和民国时期的争论,参见威廉·T·罗,“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现代中国》,16,3(1990年7月):314-19; Mary Rankin,“中国公共领域的起源”,《中国练习曲》,2(1990年秋季):14-15。

介绍

称为公团（公共协会）或法团（合法成立的协会）。此外，专业协会总是称自己为公会（公会），这个词来源于

工锁，早就被行业公会和乡土公会使用了。因此使用了律政公会（律师公会）

律师公会医会公会医会会稽士

会计师协会公会，记者协会新文吉喆公会。又发明了一个术语：律师数量

会计师向客户收取的费用称为公费（公费）。

随着专业化的展开，被强调的公共性也随之而来。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被认为属于一个专业群体，被定义为一个为公众服务和具有公众意识的群体。国家和社会普遍承认

拥有这种地位的专业人士，尽管专业协会的公开性是通过与国家的不断竞争和谈判获得的。因此，就中国专业人士而言，专业化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

中华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在过去的十五年左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是

近代中国研究的核心问题。虽然社会科学家

由于对后毛泽东的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社会和中央地方关系的发展感兴趣（见本书的结语），历史学家们非常关注

晚清（1860-1911）和民国时期（1912-1949）的地方精英活动。学者们对1860年至1949年期间地方精英激进主义的经验证据几乎没有分歧，但他们

关于这种发展是否应该被理解为

公民社会和/或公共领域。25正如 Heath B. Chamberlain 总结的那样，学者们普遍处理了申请

25. 见 William T. Rowe, “现代中国的公共领域”, 现代中国, 16,3 (7月

1990):309-29; “现代中国公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研讨会”,

现代中国, 19,2 (1993年4月); Mary B. Rankin, “中国公众的起源

Sphere,”中国练习曲, 9,2 (1990年秋季):13-60; Prasenjit Duara, 救援

国家历史（芝加哥,1995年）,第147-75页; Yves Chevrier, “La Question de

la Société Civile, la Chine et le Chat du Cheshire,” Etudes Chinoises, 14,3 (Autumn 1995):153-251。

介绍

西方衍生的概念以三种方式进入中国场景，

“改变概念以适应景观；寻找景观的变化以适应这个概念；或者完全放弃这个概念。”²⁶ 本研究认为，当公民社会的概念被定义为相对于国家的社会自治时，该概念过于局限，无法捕捉国家-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在民国时期；然而，对该概念的扩展定义可能会失去其概念化能力和分析严谨性。因此，本研究考察了各种社会群体所采用的具体形式以及社会群体与社会群体互动的具体途径。

状态。这种方法的目的是更准确地理解战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具体来说，这

研究着眼于共和党专业协会的历史

上海。

首先，共和党职业协会的性质

上海需要定义。与绅士组织不同，专业协会不属于 Mary B. Rankin 定义的那种公共领域
“对双方都认为重要的事项进行制度化的、超官僚的管理。

社区和国家。”²⁷ 专业人士，无论是独立从业者还是受薪雇员，都是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
的个人

为公众服务，并以专业专家的身份谋生。组织了专业协会以保护专业努力

促进专业利益或团体利益。专业组织最终对社区（和国家）很重要

它们的公共职能，但它们不是公共管理机构或社会调解机制 就像许多传统的

城市精英组织。

上海专业人士及其协会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关于与他们的专业利益和国家问题有关的事项

通过报纸、专业期刊、公开信函等方式，

通电、正式和非专业的专业会议以及公众

由于这些表达媒体构成了公共话语领域，人们可以将专业协会的活动视为公共领域在城市中的一种表现形式。

26. Heath B. Chamberlain, “中国特色公民社会”，中国期刊，39

(1998年1月) 69。

27. Mary B. Rankin, 中国的精英行动主义与政治转型：浙江省，1865-1911年（斯坦福，1986年），第15页。

介绍

Jürgen Habermas 定义的意义 如果可以在不参考公民社会的情况下对公共领域进行概念化。 28

另一方面,在民国时期,专业协会显然不是独立或自治的机构。作为

前面提到过,专业和专业协会的兴起

上海离不开国家的作用。专业协会的特征与专业化进程

需要专门针对专业人士的政府法规

协会。北洋政权(1912-1927),尤其是元

石开政府(1912-1916),做了很多促进和规范法律职业的制度建设。南京十年(1928-1937)的国民党政府延续北洋

促进和规范职业的政策,尽管它改变了

游戏规则。在南京维护国家政权和创建

社团主义国家 一种主要在城市地区感受到的动力 南京

积极寻求塑造和控制社会制度

出现在现代化城市中。公共协会被允许存在,

但只有在符合GMD颁布的法规和规章并接受GMD监督的情况下

党政机关。专业协会是主题

对所有公众具有约束力的专业法规或通用法规

协会。

然而,专业协会并未因政府监管而瘫痪。他们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回应共和党国家

总是被其他社会群体共享。感谢他们的专业 and

公众地位,他们经常设法绕过国家的努力

通过协商和接受以下条款来控制 and 操纵

他们将操作。因此,专业协会

能够就公共领域的各种问题采取行动。此外,

国家和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不是

始终是社会抵制国家权力的问题。专业协会

经常为了促进自己的利益而邀请或寻求国家干预。专业团体之间的互动和

因此,共和国家是多维的,有时

甚至自相矛盾。

相互作用的动力在于相互依存

国家和职业:一个合法的政府可以授予亲

28. Jürgen Habermas,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对

a 资产阶级社会类别(剑桥,马萨诸塞州,1989年),第27-56页。

介绍

专业合法性,而专业人士的支持反过来将有助于使国家合法化并为其现代化项目做出贡献,包括现代国家建设。专业人士通过国家制裁寻求其专业地位和特权的行为有助于使共和党政权合法化。律师对司法系统和医生对公共卫生系统的重要性 现代国家建设的两个关键领域 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新闻业的优势也将成为现代国家扩张合法化的必要条件。它在强调同时唤醒和控制群众的 GMD 计划中占有突出地位。 29 这些职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需要塑造了当时的政治文化,并促进了共和党和国家与国家之间协商后的相互容忍与合作。专业,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受益。

此外,两者的互动是在现代化与现代化之间内在张力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20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上海,即使不是整个中国,也是一个由外国势力主导的半殖民地社会,分为中国直辖市、国际租界和法租界。国际定居点和法国人

特许权由独立于中国当局的外国政府管理。专业协会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专业人士自觉效仿西方同行的结果。与此同时,在上海明显展示的外国特权也决定了中国专业人士对许多重要问题的反应。

但中国民族主义并不总是关于“想象中的社区”。30对于中国专业人士来说,民族主义情绪和行为往往是对影响他们作为个人和专业团体的日常生活和物质利益的外国主导地位的反应。因此,这些反应是一部分他们在其直接的社会环境中谋生并在社会和经济上取得进步的平凡计算。例如,中国律师不遗余力地剥夺外国律师在中国法院和中国案件中执业的权利。在里面

29. 关于 GMD 的“唤醒”使命,见约翰·菲茨杰拉德,《唤醒中国:民族主义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斯坦福,1996年)。

30. 这个熟悉的术语来自 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社区:对民族主义起源和传播的反思》(伦敦,1991年)。

介绍

反对外国特权的民族主义斗争,中国专业人士可以而且确实与国家合作。让事情进一步复杂化,中国民族主义不仅表现在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也有不同的华人群体受西方存在和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当地医生和当地医生之间的旷日持久的战斗医学专业化进程中的西医 这场斗争对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现代化项目(专业化是其中之一)需要中国专业人士在处理人类事务时越来越坚持使用西方派生的观念 这些观念适合他们的了解专业精神及其专业化议程。法治和司法独立是

律师将承担,而言论和新闻自由是战斗为记者哭泣。当国家表面上接受时,冲突就出现了修辞中的现代化标签,但否认其适用于中国在实践中。在这种情况下,律师的政治化和记者及其协会在共和党时代是不足为奇。

然而,1930年代日本侵略所引发的民族危机,最直接地促使上海专业人士通过他们的组织采取了政治行动。当时有一个

不同种类的民族主义,一种源于中国人的意识国家 一个想象中的社区,如果你愿意的话 受到威胁。专业团体与国家的关系非常紧张南京未能回应民众抗日抗争的诉求。然而,在此期间,他们仍然幻想破灭和疏远

在读 上海专业人士集体未挑战状态从根本上说。整体的政治文化、社会形态和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不利于中国专业人士或城市社会其他群体的全面发展,因为

独立和有效的政治力量对抗国家。

现在很清楚,“公民社会”分析框架不能完全解释历史中表现出的所有复杂性民国上海,尤其是中国专业人士。民国时期专业协会和其他城市公共组织的兴起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衰落

权力也不是自治公民社会的发展。相反,两者国家和社会机构正在扩大并相互互动

介绍

其他以新的公共形式并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代表新的社会利益。人们可以将共产党国家和社会机构之间的关系概念化为一种共生动态——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社会都在努力通过重叠和变化的边界来定义彼此之间的关系。上海中国专业协会的故事是这个过程中有意义的一部分。

在这个介绍之后,本书的其余部分分为三个部分,并以一个结论结束。第一部分(职业和专业人员)探讨了现代化如何催生新的职业和职业,并为审查职业化过程奠定了基础。第一章描述了上海现代职业兴起的历史背景,并估计了 1912 年至 1937 年间上海职业群体的规模。第二章讨论了上海职业者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生活经历,并与其他一些社会群体进行了比较。通过调查他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方式、教育程度、职业模式、社会认同和政治取向来研究城市中产阶级和职业阶层。

第二部分(社会制度、国家行动和职业化)考察了共产党国家的作用,将国家建设和职业化视为两个相互交织的过程。第三章重点论述了北洋时期和南京十年国家对待社会组织的方式。在国家对社会机构的敌视态度和积极监管的背景下,第四章描述了国家如何促进和规范法律职业,第五章讨论了国家与医学职业的关系。

第三部分(专业主义、民族主义和政治)探讨了三个专业群体在与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关系中的行动和反应,揭示了国家-社会互动共生动力中的几个重要因素。第六章追溯记者如何从传统的“文人”类别成长为专业人士,并说明 1930 年代的民族危机如何不仅帮助记者在救国运动中政治化,而且加强了他们的专业化。第七章通过描述中西医的冲突来论述上海医学专业协会的历史。现代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

以国家利益为名,为集体利益而战

介绍

形象突出。第八、九章讲述了上海律师协会的故事。第八章展示了上海律师协会如何通过坚持法治和司法独立,将法律职业的利益与民族主义的愿望和目的联系起来。第9章探讨了上海律师公会作为一个专业协会在威权国家下发挥政治作用的可能性和局限性 展示了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一种特殊形式。

结论考虑了民国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整体模式,并强调了那个时代与当代中国之间的连续性。

本研究提到了民国时期的许多社会组织,其名称的翻译遵循以下规则:

1. 如果一个组织使用正式的英语翻译,则该翻译用于本研究。因此,上海律师公会用于上海律士公会,上海医师协会用于上海医事公会,上海特许会计师协会用于上海会稽公会。
2. 如果一个组织没有使用特定的英文翻译,本研究使用“association”表示协会和公会,使用“society”表示学会。因此,上海新闻工作者协会被用于上海新文纪哲公会,乡土医学会用于中医协汇,乡土医学会用于国医学会。本研究使用“社会”或“联想”来表示慧和她。因此,公民协会用于公民会,法治促进会用于法制协进会。